

为了忘却的纪念—— 回望小汤山

■本报记者 刘丹

时间是最好的忘情水。10年过去,这里已经荒草丛生,刺柏和黄杨树在华北平原春天的大风里哗啦啦作响。

南侧一墙之隔的小汤山医院内,还有一排没有拆除的简易板房。房间里,一些纸箱外壳上清晰地印着“抗 SARS 捐赠物资”。

仅存的痕迹提醒着人们十年前这里曾经创下的一个个奇迹:七天七夜内建成一座非典医院;先后收治 680 名确诊非典病人,其中 672 人康复出院;全院 1383 名医护人员无一感染。

回望小汤山,是因为想探寻一些真相,留存一些纪念,还历史一份底稿。



奔赴小汤山

故事的讲述者,原小汤山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张雁灵将军,这位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前部长在 2012 年底刚刚接任第三届医师协会会长。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保持着军人做派,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背板笔直,目光凌厉。

“对当年的战友,我这个院长始终心存愧疚。我们并肩战斗,却匆匆来去,彼此不熟悉甚至不认识。所以我想记录下来。回望那些人那些事,就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故事从 2003 年那个不同寻常的春天讲起。2003 年 4 月 29 日 19 时 40 分,汽车疾驰在北京西三环主路上,扑向位于北京城正北 60 公里处的昌平区小汤山镇。

冷冽的风一个劲地从窗外往里灌,车上的 9 个人都觉得很冷。车窗玻璃上张贴着“车已消毒,请注意保持通风”的警示牌无声警醒着车上的每个人:“这是‘非常时期’!”

坐在车窗旁的张雁灵焦灼不安,此时此刻,他对此行的目的地依然不甚了解。

战斗打响时,军人的时间是精确到分秒的。2 小时零 10 分钟之前,他还在国防大学校

园里为论文《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安全战略》准备资料。突然电话响起,来自总后后勤部的报到命令让他顿时坐立不安——作好一个临时非典医院院长的上任准备。

他抓起两套洗漱用品就往外走,国防大学两位得知情况的学员队长执意相送。此时,临近学校开饭时间,路上行人稀少,他们一边走一边鼓励张雁灵:“保重!我们等着你回来!”“一定要保重!”握着两位相识不久的人的手,张雁灵说那一刻他感受到了什么叫做“生离死别”。

和张雁灵一样,同时接到电话的还有解放军 309 医院副政委徐达德。他完全没料到自己会临时“转换阵地”——当时 309 医院也处于非典战役的紧要关头,作为领导,他忙得两脚生风。那天他正忙里偷闲与夫人在北望山上散步,接到总后电话,立即让司机把车开到半山,趁此间隙,他轻描淡写地把事情告诉了爱人,爱人的眼眶当即红了。所有人都知道,正在建设的小汤山医院是非典“重症病房”,去那里工作的危险性可想而知。

“能不去吗?那么多人,干吗让你去?”“你又不懂医,你去干吗?”

“这是命令,哪有讨价还价的!”“你放心,我不会有事!”“哭什么!我又不会死!”徐达德后来告诉张雁灵,那时他的心里“极不是滋味”,但军人的使命容不得他儿女情长。“不要和女儿说!”徐政委撂下最后一句话,关上车门。从后视镜里看见年近 50 岁的爱人孤零零地站在半山腰落泪,再是铁骨铮铮的男儿,也忍不住鼻头一酸。谁知道小汤山这场硬仗能不能打赢?!

当晚 20 点左右,总后后勤部副部长王谦带着张雁灵和徐达德一行人一路颠簸来到灯火通明的小汤山。从 17 点 30 分接到通知,到走进小汤山,短短两个半小时,张雁灵说自己“像做梦一样”完成了交接工作,接受命令、首长谈话、报上任的全程。看着小汤山医院人头攒动的施工现场,他这才意识到将要担负的任务远比想象的艰难很多,北京 SARS 疫情发展的态势也远比他之前调查了解到的严峻得多。

后来查证资料显示,在张雁灵和徐达德接受任务的这一天,即 4 月 29 日,全北京市累计收治 SARS 病例 2705 人,其中确诊病例 1347 人,疑似病例 1358 人,66 人因患 SARS 死亡。

临战前夜

从 4 月 22 日深夜接到命令开始,在没有饮用水、没有地方住、没有办公条件的情况下,六大建筑集团联合各系统 7000 多名施工人员和 500 多台机械,经过七天七夜昼夜奋战,一个占地 40.3 公顷,建筑面积 2.5 万平方米,拥有 1000 张床位的世界最大传染病医院主体工程竣工。

寂静下来的工地,展现给世人的是一排排被绿色环绕的白色建筑。皎洁月光下,月季花悄然开放,静静等候着。

4 月 29 日晚,小汤山疗养院大厅寂静无声。先期到达的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等 7 支医疗队共 339 名医护人员静静地等候着。20 时 30 分,时任解放军总后恩军医学院院长张雁灵被任命为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这个时间距离他接到的那个电话通知,只有两个小时。

21 时,刚刚上任的张雁灵和医院党委“一班人”还没来得及相互问候,就匆匆赶往前线——他们的病房和科室去看看。

22 时 36 分,来不及及洗去满脚的泥浆,张雁

灵连夜召开了小汤山医院党委班子第一次会议。张雁灵描述了摆在他们面前的三条路。

“一是没有完成任务,只能选择带着耻辱走出去;二是发生大范围感染,都死在小汤山;三是病人有效救治,医护人员零感染。”

“我们走第三条路,带着所有的医护人员活着走出小汤山!”

他攥紧的拳头砸在茶几上,重重的,发出的声响震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他还记得,那一夜,小汤山多了不少“假小子”和“光头”——为了防止感染,小汤山医院要求每个医护人员必须剪短发。满头白发的老主任张德洲剃成了光头,大家差点儿认不出来了。呼吸内科副主任金远林摸着自己的头说:“活了 46 岁,我还是第一次理光头。”张培月看着镜子中的自己,一时接受不了,一头养护了 20 多年的黑发变成了板寸,而她和她的战友中有许多人可是新娘子或准妈妈。她们说:“头发有记忆,会记住我们的付出。”可是长发落地的那一刻,许多人都流了眼泪。

看不见的敌人

SARS 病人马上就到,一、二、三、四、七、八病区的大门几乎同时打开。

2003 年 5 月 1 日 23 时,八达岭高速公路上,蓝光飞旋的救护车刺耳的叫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尖,划破了北京城寂静的夜空。恐惧和危险终于降临。

23 点 43 分,第一批急救车在警车开道下,载着 19 名 SARS 患者驶入小汤山医院西门。司机打开车门,52 岁的东城区居民于阿姨下车,她是小汤山医院收治的第一名非典病人。护士长韩芳第一个迎上去:“您好,我来帮助您!”30 多名医护人员将病情最重的几位患者接下车后送往病房。

“他们非常害怕,口罩捂得极严,目光中流露出深深的无助和企盼。”张雁灵回忆道,本来第一批计划转运的 156 名 SARS 病人只动员来了 134 名,有些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来。“这是医院吗?是正规治疗吗?你们能治好我的病吗?为什么把我们弄到荒郊野外?这里是不是‘死亡集中营’?你们是不是拿我们做实验?”一位 40 多岁的女患者,下了车就靠着墙哭。有些人甚至用手死死把着车门,无论如何不肯下车。

其实在小汤山医院组建之初,有外电曾经预言:“北京政府建立这么大一所野战医院的决策或许是错误的,极有可能让成批的军人倒在小汤山。”“小汤山医院就是中国的 SARS 病毒库,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爆炸。”

“北京建成了一个 SARS 集中营。”“哪里是与世隔绝的病人监狱。”谣言满天飞。对小汤山,人们谈之色变。超市里的“小汤山蔬菜”不得不换了头

脸不再贴小汤山标签。小汤山找不到理发师,不管你给多高工资,就是没人来。最后张雁灵不得不向自己的老单位求助,从石家庄火速调人来小汤山才解决了医护人员的“头顶大事”。

在小汤山战场上,张雁灵和他的战友需要打败的除了病毒,还有人们心中的恐惧。

有很多记者问过张雁灵:面对这么多 SARS 病人,你们害怕吗?他总是坦坦荡荡地回答:当然害怕!

只是他心里十分清楚,无论是谁,当他真正去面对一位在死亡边缘需要救治的非典患者时,他们心里的善念与职业操守决定了他们没有退路可以走。

其实最让他担心的是重症监护室。对抗 SARS 的战争,有人曾有过这样的比喻:接诊中心是前哨战,污染区是阵地战,ICU(重症监护室)是攻坚战,整场战役是看不见敌人的遭遇战。在张雁灵看来,重症监护室是他们与 SARS 病毒抢夺患者生命的最紧要的“无名高地”,双方势在必得。

转入重症监护室的病人全是危重患者,毒性最大、传染性最强,随时需要插管吸痰。特别是气管切开,每一次都会造成患者气管分泌物的猛烈喷射。那些四处飞溅、带血的痰液和分泌物常常溅得医护人员满脸满身。这是全院最危险的第一线。

而重症监护室的 36 名军医和护士就是名副其实的“敢死队员”。他们曾 7 次在重症监护室里与死神抢夺一名 68 岁老者的生命。

那一刻,张雁灵站在他们身后,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打开的魔盒

这样的情景他上任之前是有所了解的,因为那篇专业论文的开题几乎和 SARS 进入北京是同一个时间。

2003 年 2 月 9 日,广州市 SARS 疫情突破百名患者大关,死亡病例在不断增加。广州市民涌上街头,排起长队抢购板蓝根冲剂、抗病毒口服液、医用口罩,甚至还有食用醋。

而此时的北京仍然处在懵懂中。时任解放军总后恩军医学院院长,还在国防大学深造的张雁灵也像其他生活在北京的普通人一样,通过媒体关注着广州发生的“流行性肺炎”。

3 月上旬,他开始走访北京各大医院,为论文搜集资料。作为医务工作者,他并未意识到这个疾病有多危险,唯一的防护工具就是一个普通口罩。

解放军总医院、302 医院、佑安医院、人民医院等 9 家大型医院,所到之处,尽是发热的患者,他们的表情写满焦灼、急躁、痛苦甚至是恐慌。

对于北京城来说,2003 年 3 月 1 日是一个做上黑色标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北京与 SARS 遭遇,也就在这一天,北京首次拉响了 SARS 警报。

3 月 1 日凌晨,一辆山西 120 急救车疾驰进入北京城。凌晨 1 时,27 岁的山西太原籍女子于某由于多日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魏东光亲自护送下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

于某来自山西,而她的“肺炎”来自广东。全球首例 SARS 病人是广东人黄杏初。他是一名厨师,一直在深圳打工,在后来众多媒体的报道中,他被称为中国内地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的

报告病例。

2003 年 1 月 2 日,由于突发高烧、咳嗽不止,黄杏初被送到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诊断其症状为“持续高热、干咳、X 线透视显示阴影占据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无效”。

专家们给黄杏初临床诊断为“非典型性肺炎”。这是将 2003 年流行的“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称为“非典”的首次亮相。后来,又有人将其英文单词的首字母连接起来,简称“SARS”。

住在医院里,病情也没有像黄杏初之前预想的那样一天天好起来,反而越来越严重。1 月 17 日,这位厨师开始出现呼吸困难。

与此同时,神秘的病原体开始肆意传播,仅在 2003 年 2 月 5 日至 10 日,广东省每天确诊的 SARS 病例就有 50 多例。广东成为中国内地 SARS 首个重灾区。

然后是北京。山西人于某是一位珠宝商人,她在太原的某商场有个珠宝专柜,由于是旺季需要进货,她决定去一趟广州。临行前听说广州流行一种神秘的“怪病”,于某有些担心,多方打听,了解到“广州的肺炎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什么危险”。于某还是不放心,给广州的同行打电话,得到的答案是:“都是谣传,没那么玄乎。”2 月 19 日,于某南下广州,而 4 天后在北上的火车上,于某感到了身体明显的异样:累且浑身发冷。此后,她的病情进展迅速,山西的医院治疗效果不明显,于某决定连夜赴京治疗。

3 月 1 日凌晨 1 时,于某因“发热、待查”住进解放军总医院急诊科病房。

至此,潘多拉魔盒在北京打开。

从后来公开的资料看,于某正是北京的首发病例。她导致了一批医护人员感染,其父母也因 SARS 客死北京。

传染链还在继续。

此后的几天,各大医院烽烟四起,北京已被 SARS 困住。

有着 85 年历史的著名综合性医院——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以一种近乎惨烈的方式进入了人们视线。从 3 月下旬至 4 月 23 日,人民医院共确诊非典患者 120 多名,其中本院医护人员竟然占了 93 人!

恐惧由此产生,所有北京市民开始选择躲在家里,不停喷洒消毒液。一夜之间,某普通消毒液的价格从每瓶 3 元暴涨至 15 元。

经历过 SARS 的人应该不会忘记“4·20”。这一天,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新上任的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坦率承认,北京疫情已经十分严重。截至 4 月 18 日,北京已经确诊非典患者 339 例,疑似病人 402 例。然而仅仅在 4 天前,官方公布的数字是 37 例。

北京政府决定采取非常措施——封!不封不行了。4 月 20 日,遭受重创的人民医院院长吕厚山向上级写信,请求把所有非典病人赶走,他们自己隔离消毒。这是人民医院对自己、对患者负责的最后办法。

吕厚山后来回忆说那时他“觉得自己没有活头了,几天里流的眼泪比之前的半辈子还多”。不仅院长哭了,医护人员哭了,连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也哭了。

建一所临时的传染病医院,已经成为当时北京别无选择的选择。

为什么是小汤山

2003 年 4 月 22 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北京防治非典工作联席会议。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建议,如果医院不够用,可以考虑租用疗养院,比如条件比较好的小汤山疗养院。

会后,时任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和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随即赶往小汤山。他们欣喜地发现,疗养院虽然只有 200 张床位,但旁边有一大片预留的发展用地。

时任解放军总后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白忠书带

着部队专家实地勘察后,认为这里确是一块建设新医院的好地方:离最近的居民点 500 米,四周环境空旷,便于机械化施工。

对于市区环境的影响呢?根据近 3 年的气象资料分析,5 月至 8 月多为东风,月平均风速 2 米每秒左右。京密引水渠在小汤山疗养院北面 4 公里,污水可经专门处理,由现在的市政管道向东南排放,不会影响北京市水源。

天时地利,军地双方一拍即合,新建的传染病医院就此选定小汤山。

4 月 22 日当天下午,国务院对北京市的请求作出明确批复。国家紧急征用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土地 40.3 公顷,用于建设非典定点医院。

第二天(4 月 23 日),建院 85 年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而此时,在它的正北方向 33.8 公里处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规划已经敲定:一期工程建成东、西区两部分,两区各包含 6 排复合轻钢板材料建造的病房,其中东区 216 间病房,西区 292 间病房。



小汤山医院里的患者



2003 年 6 月 20 日,小汤山医院病房贴上封条。



2009 年,小汤山医院外景。

小汤山,离天安门有多远

5 月的北京,最高气温已经飙升至 30 摄氏度以上,这样的天气只要稍运动一下就会满身大汗,更何况要穿上里外三层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来回小跑着工作。

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

终于有人忍耐不住,直接推开这个临时医院院长的办公室门,问题很直接:“咱们还需要坚持多久,难道每天就是 6 小时、6 小时地转下去,未来的路在哪里?”

当时主管卫生领域的吴仪副总理也曾经焦灼地向张雁灵:“这个病还要持续多久?”他当时的回答是,按照规律,高温将不再适合病毒传播,估计两个月之后“应该会下去”。

2003 年 6 月 20 日 10 时 05 分,最后一批 18 名 SARS 患者康复出院,此时距离小汤山非典医院正式收治 SARS 病人只有 50 天。到了该给这所世界上收治 SARS 病人最多的传染病医院贴封条的时候了。

急救车的警笛声在慢慢远去,小汤山上蔷薇开了,洋槐开了,紫丁香也开了。

医护人员宿舍楼的外墙上,从上到下挂满了全军大小医院的战旗,火红热烈。苦战 50 多

天后,小汤山的所有战士们第一次相聚在一起,大家终于可以摘下厚厚的口罩,脱下密不透风的防护服,穿上整齐的军装并肩坐在一起。

战斗胜利了,战士们马上要启程了。真想去天安门看看,真想去长城走走,冒死战斗了 50 多天,没有太多奢求,只想在离开北京时到城里看看。张雁灵为此特地给大家安排了一天:先去天安门升旗,然后去爬长城,再返回驻地。请示报告刚刚递交上去,却接到了上级“立即撤离”的命令。

军令如山,马上撤离!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十年后,当张雁灵重读这句诗时,已经有了别样的体验。

完成使命的张雁灵说,他只是个临时列车长,有责任把每一名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本来想好了要去天安门走走,去一次八达岭长城……冒死战斗了 50 多天,没有太多奢求。”然而上级“立即撤离”的命令已经下发。

6 月 23 日清晨,北京城还在沉沉的睡梦中,小汤山医院首批 900 名医疗队员从北京撤离。

一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在瑞士日内瓦总部宣布,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